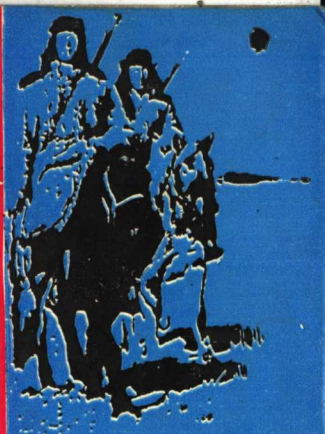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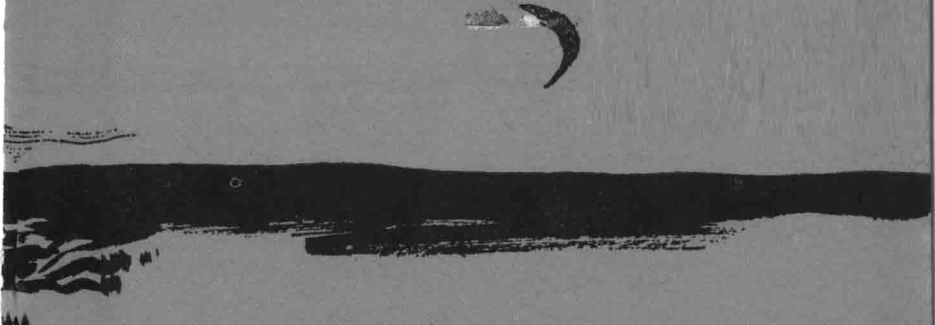


黄尧
蒋巍等著
石舟编

辉煌的青春梦

知青生活纪实





黄尧 蒋巍等著 石舟编

辉煌的青春梦

——知青生活纪实

苦菜花

解放军是英雄花，
工人是光荣花，
农民是向阳花，
营业员是玻璃花。
知青是苦菜花。

空房，
下放，
厨房，
稳当。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邮码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90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1 插页: 2

字数: 247,000 印数: 1—10,500

ISBN 7—5404—0595—3

I·484 定价: 4.30元

目 录

记忆的价值(序).....韩少功(1)

缅共游击战中的中国知青.....黄 尧(4)

1978: 西双版纳八万知青返城风潮.....张力甫(57)

一首知青歌 九年铁窗味.....肖 明(68)

知青时代的刘晓庆.....陈显浔(87)

棋圣聂卫平插队轶事.....李型明(97)

梦里青纱帐.....蒋 巍(100)

遥远的太阳坡.....韩 刚(139)

“扎根派”的代价.....韦 洪(158)

我的黄河之歌.....刘德奎(179)

“再教育”片断.....宋国锦(194)

梦断荒山.....朱维红(203)

“炼狱”小记.....张伟健(213)

办“病退”.....董兰娣(229)

发黄的信札.....王焕君(237)

苦涩的恋情·····	毛 弟(256)
知青点纪事·····	刘 奇(273)
插队“绝技”·····	寒 杀(283)
不堪回首话当年·····	吴 政(288)
“文武双全”的年华·····	古 月(298)
招工的喜剧·····	符尚志(309)
我们是很优秀的(代后记)·····	陆幸生(320)

记忆的价值

——序《辉煌的青春梦》

韩少功

当那一段用油灯温暖着的岁月渐离我们远去，“知青”这一名词是愈来愈显得生疏了——尤其是对于流行歌曲哺育大的新一代人来说。时光匆匆，过去之前还有过去之前还有过去，我们几乎已经忘记了井田制，忘记了柏梁体，忘记了多少破落王府和寂寞驿站，为什么不能忘记知青？

毕竟有很多人忘却不了。

乱石横陈曲折明灭的一条山路，茫茫雪原上悬驻中天的一轮蓝色新月，某位背负沉重柴捆迎面走来的白发老妇，还有失落在血红色晚霞中一串牛铃铛叮叮咚咚的脆响……这一切常常突破遗忘的岩层，冷不防潜入某位中年男人或女人的睡梦，使他们惊醒，然后久久难以入眠，看窗外疏星残月，听时间在这个空阔无际的暗夜里无声地流逝。

对于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最深的梦境已系在远方的村落里了，似乎较难容下后来的故事。哪怕那故事代表电大或函大文凭，代表美国绿卡，或是代表个体酒吧里的灯红酒绿，它们都显得模糊和匆促，匆促得无法将其端详，更无法在梦境里定

格出丝毫毕致的清晰图影——那远方的村落。

这缘由也简单：多因了苦难。

人很怪，很难记住享乐，对一次次盛宴的回忆一定空洞和乏味。唯有在痛苦的土壤里，才可以得到记忆的丰收。繁盛的感受和清晰的画面，存之经年而不腐败。发生在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间的一场政治和经济危机是如此盛产着记忆。数以百万计的青年学生被抛到了穷乡僻壤，移民运动的规模几乎空前绝后。这些青年往往衣衫褴褛，身无分文，辗转于城乡之间，挣扎于贵贱之间，求索于文明与野蛮之间、真理与伪学之间。餓其体肤，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常常以日当年地守着油灯企盼。他们多年后带着心灵的创伤从那里逃离的时候，也许谁也没有想到，回首之间，竟带走了几乎要伴其终身的梦境。

这梦仅仅属于他们自己。不仅后辈人将讨厌任何用作炫耀和教诲的苦难，连他们曾密切相关的友人，也毫无义务要把他们的苦难看得特别要紧。我曾返回当年落户务农的乡村，陌生的新一代农民已行行列列地高大着，对寻访旧地的知青只能漠然。一些旧相识已多老态，谈起往事也只能闪烁其辞只鳞片爪，象谈起远古一个模模糊糊的传说。除了找到某堵旧墙上半块褪了色的油漆语录牌算是知青们可笑的遗迹外，那里没有纪念碑。

不会有纪念碑，不会有金质勋章，不会有档案馆史料办离退休老知青活动中心，甚至未能熬过那岁月的男女学友们，远方的坟前不会有鲜花和新土年复一年。关于遥远村落的梦境，只能默默地属于他们自己。

当然不值得沮丧。时光总是把苦难渐渐酿出甘甜，总是越来越显示出记忆的价值。作为人的证明，记忆缺乏者只能是白痴，是动物。作为生的证明，生命留给我们每一个人的除了记

忆还有别的什么吗？难道是日本舶来的电视和冰箱？或是吃过了又拉过了的酒肉？

幸福已存在了上下数千年，并不是电视和冰箱时代的专利。幸福也将伴随人类继续下去，行将经历谁都阔绰得根本不用电视冰箱当然更不靠油灯照明的时候。但是，即便在那个时候，也不是任何人都幸福的，并不是任何人都能够获得记忆的富有。

步入中年的知青们，历史已在他们记忆的底片上，在他们的身后多垫了一抹黄土地，或是一面危崖。这使他们继续长旅人生时，脊梁骨后多了几分承托和依靠。他们中间的多数人，也许会因此而欣慰，而充实，而多一些迈向前路的沉着。

由我们几位朋友通过一份杂志开始征稿、并由湖南文艺出版社最后编辑完成的这本知青回忆录，就是献给这些人的。

愿他们在睡梦惊醒时，这本小书能陪伴他们到天明。

1990年3月12日

缅共游击战中的中国知青

黄 尧

编按：“文革”期间，我国的外交政策受到左的思潮干扰，我国的法制更荡然无存。少数上山下乡的红卫兵自发地违法私越国境，参与了缅甸内战，“支援世界革命”。这一错误的做法后来为我国政府所努力纠正。今天，当事人们回首当年，那遗落在异国丛林中的理想主义血痕，也许将成为一种历史陈迹，承受后人审断的目光。

不是所有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历史，因此，不是所有人都有权实录自己。然而，不是所有历史之树都准备为你们结出公正之果。

你们说：在历史评价我们之前，我们已给了自己评价，我真诚地生活过，因此我终生富有。

你们还说：如果我在第一场战争中就被枪弹击中，我将永远年轻。“幸运”在那个时代是个怯弱卑污的字眼。因此，作为不幸的“幸存者”，请为我隐去真名。

——题记

一封来自国境线的告别信

1969年3月的一天,对我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日子。我照例在黎明前醒来。往常,这是传讯的时刻。我的看守——一个细高个,头颅奇小然而坚实的中年人,将一双亮亮的眼贴在小窗上,往室内扫瞄一圈。今天,这个动作被省略了,跟着他的脚步声,是铁锁打开的声音。

“这间房子要打扫,你先搬出来。”他说。

我心里却在揣度:转移?我被三次转移过,最早是在黄楼的一间小屋,那段时间很短,后来搬到一间宽阔的堆满杂物的仓库。我在那里度过了最艰难的日子,熬出来不容易。军代表小刘(我一直只能记住这个同龄军人的姓)怕我受刑后死了,剪了电灯线,点一支蜡烛守着我;第三次便是我要搬出的这间单身牢室。我记不清自己上过多少次刑,最后一次是在“科学馆”,绑在大树上,锄把捅塌了我的两根胸肋。为着这一天和预料中的处境,在1968年6月至11月的逃亡期间,我一直在搞重器械的锻炼,把身体弄得挺结实。可临到那一刻,我还是喊出来了,我对拷着我的小刘军代表大叫:“这是为什么?”

他没有回答。

转移?还是腾出旧屋住“新客”?我知道在我之上,没有更高级别的收审对象。1968年年底在云南全面展开的“划线”运动,将一派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据1975年的统计数字,受到各种刑讯、逼供、审查、监禁的达30万人,其中37000余人死于非命。

“以革命的名义”屠戮,“以革命的名义”背叛,“以革命的名

义”引颈待杀和被杀——这是一场空前的“革命大霍乱”。杀人者慷当以慨，背叛者可以免除良心的自责，而被杀者甘为牺牲——在很多年之后，人们评价这段历史，不会有选择词句的困难，他们可以找到简单的类比：法西斯蒂、宗教战争等等。但是，至少在那个时期，“革命”本身——“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理论”，在年轻一代中还未受到本质的怀疑。

和我同期关禁的有师大附中的傅衍鹏等人，昆明第十中学的刘晓光、林柏，十二中学的范严光，女中车佩明，十一中裴滚泥、毛昆明以及与我同校的宝章、赵力、培宙。他们大体分属于当时昆明地区最大的两个中学生红卫兵组织。有消息透来：即将召开的“九大”将亮出“团结”的“红牌”。原先被结合进省市革委会的少数学生委员，已经恢复了参加某些会议的资格。我们当中有的人甚至同他们有过了几次秘密接触。

猜测很快被证实了。

我被带出“鲁园”，来到一所木楼前，在楼口工宣队长堵住我，“……你得给我牢牢记住了，你这样的人，枪毙十次也不为过！嗯……”他吼道，“你的罪名够了！十次！嗯！”

我有将近10万字的罪证，其中两篇文章是直接攻击林彪副统帅的《论形式主义的反动性》及《再论》，我嘲讽他的伪“忠”，批驳他的所谓“绝对权威论”，黑纸白字，我跑不了，仅此一罪，杀头足矣！还有若干攻击江青、康生的文字，洋洋万言，通过红卫兵的有线广播，遍布昆明十里城乡，这还不算那些参与论战的传单，红卫兵小报“屁股”上杂文式的“补白”。我的“难友”们也大多如此，打一个“现行反革命”并非什么精巧的手术，诱发一次内部的叛卖，就能轻而易举将十个人送上断头台。衍鹏、严光等人都有“言论罪”。

工宣队长一扭头走了。

我知道就此解除了长达百日的单身囚禁。

很快，我见到了宝章和赵力。他们俩是被关在游泳池附近一间破屋里的。我们还不能自由交谈。头一天赵力把两本《李自成》带到“牛棚”里看，遭到工宣队长一顿训斥。

在长长的“请罪”行列里，我可以挨着他们站立，吟读各自熟背默记下来的“请罪书”。过后，便是惩罚性的劳役。赵力最期盼这一时刻。这一天，他持一把扫帚在地上划着，慢慢挨近我，左右环顾之后，匆匆在泥地上用竹梢刻下“北”字，又刻一个“南”字，后一个字下了狠劲，显得奇大。他往“南”字上蹬蹬脚，抹了。

第二天，依旧那一时刻，他刻下“北”、“南”，向我眨眨眼，我仍有些惘然，他迅疾地在“南”字下首写了一个“亮”字。

“北方不亮，南方亮？”我吟哦道。

他诡秘地笑了笑，对我迟醒的悟性有些怅然。

“什么意思？”我替他蹭掉地上的字。

“南方来信——很多人都跑过去了——跨过国境线参加缅甸共产党的游击队！大富你认识吧？白猫你认识吧！都过去了！很多人在边境上见到他们：绿军装、红帽徽、一式的现代装备！”

他眼里闪射的不仅是希望，还是火。

时隔多年，当那最后的音符在边境那边的山地丛林渐渐沉落，有人才幸运地在一份旧日的档案里读到有关部门的统计数字，1969年6月，因各种原因逾境参加缅共游击队的红卫兵已达300余人，他们的籍贯包括云南的昆明、保山、潞西、腾冲、施甸、其中昆明知青略占一半。也有少数原属建设兵团的北京、四川知青。

南风捎来的神话，在我们小院的墙角旋卷，扬着那些大字报栏上驳落下来的废纸，有声有色地荡出了一块湿漉漉的净土。

“苍天容我再生一次！”赵力忽然仰天叹道。

5月下旬的一天，我收到来自德宏潞西县勐戛的一封长信。我久绝音讯，捧着沉沉的，略有些泥土腥气的信，双手发抖。

一页白纸，布满细碎的皱摺，红的、黑的隐隐的指印。红的是土？黑的是炭？

信的帽头上依红卫兵最习惯的方式摘录了毛主席的一段诗词。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

黄尧，敬爱的同志：

首先，请允许我们代表你的全体战友向你致以最亲切的问候。

5月16日，我们来自潞西三台山、盈江、陇川、瑞丽的数十名战友聚集在勐戛小石桥村，共同纪念这个伟大的日子。

此刻，篝火熊熊，遥望北斗，我们心潮澎湃，更加怀念那些曾使我们热血沸腾，身心激荡的战斗岁月。

中国的未来是属于我们的！世界的未来是属于我们的！我们不能忘记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世界革命的历史责任天然地落到了我们肩上，中国红卫兵运动没有完结，它将以前所未有的潮头推向那些腐朽黑暗的角落，荡涤一切污泥浊水，开拓一个没有剥削、没

有压迫的新世纪，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

我们当中，将有一批人首先踏上征途，用我们的血，去灌溉异国的自由之花。白骨何所弃留，“赤遍环球是我家”！请相信你的战友不会玷污这面光荣的旗帜。

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飚为我从天落！

中国红卫兵万岁！

下面是47人的签名：安波、钟秋、罗毅、鲁生、美刚、纪隆、王兰、文华、崇杞、家晨、龚敏、桂玉成、王兰平、许儒多、朱潜云、郭津德……最末一个是运宽。

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或者说不熟悉。

在那许多草草签留的姓名中，有一个重重扣击着我的心：郭津德。他是我的同班同学。我太了解他：若有一个以一死而了却“碌碌无为”的机会，第一个挺身而去的就是他。

他是一个射击运动员，想当兵，想得痴迷。他说过，如果能早生30年，长征路途、雪山、草地就会留下他的脚印，领一代风流的就是他，而不是别人！

他是一个抱着沉重的理想爬行的人，永远追不上辉煌的辙迹，在极度无望中他悲嚎过：有人18岁就以一腔热血写就英雄历史，我22岁了，人依旧空耗岁月，任血液凝固僵冷……

“格瓦拉行动”·英雄偶像

1967—1968年，正当中国大地上波澜涌起、中国人为着一场空前的“大革命”而狂热行动时，两个世界性的人物猝然结束了他们的神秘生涯。

一个是格瓦拉(Guevara, Ernesto<“Che”>),古巴革命的杰出人物;一个是缅甸共产党领袖德钦丹东(Than Tun, ThaKin)。他们都极富传奇色彩,都忠诚于信仰并寻到了纯粹革命英雄式的悲壮结局。对于中国,中国的国情人情,中国正在发生和已经发生的事,他们都只能是辽远天角的星宿,奇特的是他们又都理解和同情当时的中国。

然而,谁也不会想到:两颗星宿的陨落竟会楔入中国这块震荡不已的土地,对中国红卫兵的最后命运产生了影响,使那最后的音符跃动,跳荡,发生了无可意料的律变。

格瓦拉提供的是一种英雄模式。德钦丹东提供的是行动的可能性。二者都坚信只有革命的暴力和武装斗争才能解决各自碰到的问题。

德钦丹东,生于1911年,早年就读于缅甸仰光师范,当过中学教员,倔强的马克思主义者。坐过牢,1943年成为地下抗日运动领导人,1948年3月建立白旗共产党,1964年缅甸共产主义运动分裂时,这位领袖坚决站在中国一边。1968年9月24日,他遭到刺杀,在缅甸北部的丛林中,游击队的营地。稍前,1967年10月8日格瓦拉和他所训练的游击队团被农民出卖而覆灭,他受伤被俘,旋即遭玻利维亚政府军枪杀。他才39岁,但至少已有15年以上历尽艰险的战斗生涯。丛林,最多的是热病、疟疾、更多的却是贩卖。

1968年10月以后,在毛泽东的接见名单上出现了已故缅共领袖德钦丹东的继承人,身着绿军装的毛泽东让他们站到了自己的身边,《人民日报》以显著位置发表文章介绍缅共业绩,于是,人们的视线才透过这稍稍开启的历史帷幕,投注于中国西南这个弱小、多山的邻国。那里的共产党人已经坚持了近30年

的武装斗争。

处于“文化大革命”高热状态下的红卫兵，相信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中国所提供的革命样板毫无疑问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甚至中国今日的“文化大革命”也必将推向全世界去，他们准备了足够的同情心和为世界革命献身的无畏精神。“世界是你们的”——他们从小便得到过这样的许诺：“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他们早早被规定了一个革命者必须具有的立足点，早早地被贯注了这样的气概。而且，在中国红卫兵看来，缅甸丧失了他们久经考验的领袖，革命已经到了危急关头。

这时，格瓦拉的英雄模式出现了。这位被法国哲学家萨特称为“我们时代最完善的人”在中国红卫兵的眼里是最为英俊的人物。1968年中国出版了格瓦拉记录自己在玻利维亚最后生涯的《日记》，这本小册子我们今天已经很难找到它了，在当时也只是有限制地发行。但不知有多少中国红卫兵怀里揣着它，或在绿帆布的挎包里珍藏着它的油印、手抄本而毅然投身到异国土地去。用热血浸透了被弹片啃噬成齿状的纸页。

格瓦拉，生于1928年，西班牙和爱尔兰人后裔，出生于阿根廷，似乎有着天然“国际公民”的血统。早年曾完成医学专业，但志不在此，1953年3月，他带了大批书籍去旅行。早在学生时代，他曾骑自行车和徒步在阿根廷、秘鲁和智利游历过不少地方，在南美洲各地的考察，使他充分体验了被压迫人民的困苦与贫穷，从而相信只有革命暴力能拯救他们于水火。这个知识渊博，信仰笃诚的年轻人开始宣传社会主义革命，由于他激越的讲演经常带有阿根廷人加强语气时用的惊叹词——“切”，被拥戴他的人们赋予了“切”的尊号。他曾参与危地马拉阿本斯领

导的民主政府，后来他的愿望随着阿本斯政府的颠覆而毁于一旦，他流亡到墨西哥，在那里遇到了古巴卡斯特罗兄弟，参加了他们的游击队。从此，格瓦拉以他的卓杰才能而成为了1956—1959年古巴革命的杰出人物。最初，这位游击战理论家凭借的是“西班牙经验”，到了马埃斯特腊山时期，他惊异地发现并读到了毛泽东的游击战论著。1959年1月，古巴革命胜利之后，格瓦拉曾任古巴全国土地革命委员会主席，国家银行行长和工业部长。1965年4月，这位卡斯特罗最干练最勇敢最受信任的助手突然从公众场合消声匿迹。10月，卡斯特罗公布了他的一封信，信中说：“因为其他国家需要我微薄力量的帮助”，所以他决定到这些国家去参加解放斗争。以后两年，他到过刚果，帮助组织卢蒙巴营并参加内战。1966年夏，他辗转到玻利维亚圣克鲁斯，在那里组织训练游击队。他作为一名最忠勇的战士亲自投入战斗，直到壮烈捐躯。格瓦拉的牺牲引起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巨大良心的震颤，抗议虐杀的声浪及悲愤的追念，热烈的颂歌一时响彻全球。

那时的中国红卫兵对格瓦拉其人的了解远不及这样多。

尽管如此，一个朦胧的格瓦拉对于他们就足够了。格瓦拉的魅力在于他一生充满革命的行动感：放弃作为个人成功的标志——显赫的名声和高官厚禄的职位，甚至放弃古巴国籍，不停顿地跨国界行动——一个说到做到，纯粹无私无畏的国际主义战士的形象，对于处在“革命饥渴”中的红卫兵意味着什么，这是很明白的。